中國夢帶出了繁體夢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經常兩岸往來的朋友，總有些簡體字看不懂，就是看懂了，也寫不出，上次曾說過，有回跟朋友到廣州銀行辦手續，朋友以繁體填交表格無效，職員要她重新另填簡體，朋友一時呆住，不知如何下筆，最終還是由半「文盲」的港客寫一個字想一個字，腦筋轉過幾個彎才幫了這個忙。

繁簡體字看得出，寫不出，對香港和內地朋友來說，現象十分普遍，一般公司招牌倒還可以看行業揣摸出來，碰上重要文件，就有點兒尷尬了；正如來港旅遊的朋友，對繁體字有時也同樣感到困擾，只是店舖為了做自由行生意專意標貼簡體，反而沒有必要，近年在內地好幾處地方，倒看過不少繁體字招牌，是香港人開的店子還是專做香港人生意則不得而知了，初初以為內地繁體字已消失，原來並不然，最近看到一張宣傳「中國夢」的圖片，寫在地面上這三個行書大字，每個字平方四五米大，那個十一畫繁體國字，多麼美麗而具氣勢！

他鄉看到繁體字，不只有他鄉遇故知的興奮，而且還有點兒新鮮感，看來兩岸磨合，就靠繁簡一步一步拉近了，問過內地一個大學女生可有認識繁體字，以為她會愕然搖頭，誰知出乎意料，她欣然說懂，而且認真學過，原來她就讀的廣西民族學校，就有繁體字這一課，教授自必然已上了年紀，繁體字沒消滅，就好；打從小學開始，就更好了。

到底都是方塊字，無論是繁是簡，多看就自然看得懂。其實繁體簡體，也不必刻意上什麼課，只要平日繁體簡體的書報文件都找來看，同一詞彙，看多了，漸漸就會明白，「繁體人」看簡體，字體結構沒痕跡可尋，難度略高；「簡體人」看繁體，初時不免怕煩，只要上了興趣，總比「繁體人」學簡體容易得多，因為好些圖像化的繁體字，有如看圖識字，看字便如看圖，容易認得出來，中國夢連帶完成繁體夢，就更令我們的文化豐富而扎實。

天一生水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終於來到天一閣！這是二十年前的一趟旅程的延續。

當年陪伴現已過世的母親大人遊普陀山、禮佛嚐齋，途經寧波，忽發雅興，欲一窺中國第一間私人藏書館，特別在回程時，繞道而來，卻碰着休館，被拒門外！

二十年後的今天，乘着深秋啖蟹之約，在馳赴陽澄湖前，來一個浙東淺遊，就把天一閣排在行程首天，還要不是休館的周一，由香港直飛寧波，由寧波機場直奔天一閣。

天一閣隱藏在一條不起眼的小巷裏，於明嘉靖四十五年（一五六六）年，由兵部右侍郎范欽興建。據說，范欽嗜書如命，宦海沉浮，每到一處做官，總留意收集當地公私刻本，無法購置者，則僱人抄錄。經史子集、百家之書，兼收並蓄。個人藏書鼎盛時期超七萬卷，其中明代地方誌和科舉錄最為珍貴。

聽同遊的李前輩為大家講解，天一閣之所以這麼有名，有四個原因，一是藏書質量高、版本精善、文獻翔實。二是數量驚人，珍本多。三是四庫七閣的樓閣形制非常獨特，讓後人紛紛仿效；當年乾隆皇帝啓動《四庫全書》編寫工作時，天一閣便進獻藏書近六千卷，《四庫全書》建成後，乾隆皇帝對天一閣藏書樓在防火等方面的構造非常仰慕，便命令分儲《四庫全書》的七個藏書樓——也就是著名的「四庫七閣」，全部按照天一閣的形制建造。四是十三代四百年間天一閣並無損毀，是中國乃至亞洲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，也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藏書樓之一。

李前輩解說，天一閣之名，取義於漢鄭燮《易經注》中「天一生水」之說，因為火是藏書樓最大的禍患，而天一生水，可以以水克火，所以取名天一閣。一直感覺「天一閣」這個名字很特別，想不到原來內裡包含着如此深遠的智慧。

導演與編劇，哪一樣更難？

琴台客聚

孫浩浩

公司安排編劇們上的導演班，課堂上的課程經已完畢，餘下的就是要在一月份之內完成我們的final project，我們需要揀選一段大約五至十分鐘的劇本，進行為期兩天的拍攝。第一次嘗試做導演的滋味後，我不期然問自己，究竟做編劇難還是做導演難？

成為編劇多年，已經無法計算曾寫過多少個劇，但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做編劇很難。編劇是一項從無變有的工作，由構思故事、設計人物、度分場，以至到寫劇本，整個過程漫長而痛苦。好多人以為懂得開口講說話的，就等如識度橋，懂得寫字的就等於識寫劇本。曾經試過有監製拿着劇本，批評這處不滿意，那兒又不合理，劇本被插得體無完膚，對方以為寫劇本很容易，嘗試自己執筆重寫，但當他拿起筆，對着一張空白的原稿紙時，就開始明白，去批評人家的劇本容易，但要你逐字逐句寫滿一張白紙，原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編劇的工作好多時都要孤軍作戰的。雖然電視劇都是集體創作的，但好多時一條橋要人家接受，往往要在腦裡面醞釀多時，即使是同組的編劇，只要對方未能第一時間捉到其要點及精髓，構思隨即會被ban。所以無論構想一條大橋或設計一個人物，有時都需要先在腦裡面思索一段時間，組織鋪排好，然後再拋出來。有時候，我們也需要獨自去做分場，而寫劇本就更加是lonely time，只能獨自去面對的。如果這段時間大腦閉塞，想不到就是想不到，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到你，一個人陷於苦戰之中，你都咪話唔痛苦。

導演的工作則在完成了劇本之後，才正式開始。他們的工作不是從無變有，而是要把文字轉化成影像，影像包含聲畫的配合。聲音方面，除了對白之外，還有音效、配樂，而畫方面則牽涉燈光、演員、梳化服等。換言之，基本上所有攝影、燈光、音響、演員、道具、服裝、化妝各個部門都跟導演有關，導演就好像一隊軍隊中的將領，帶領着整隊軍隊去衝鋒陷陣。

導演從來不是孤軍作戰的，因為他的背後永遠有整隊軍隊做後援，演員若能夠演得好，就已經事半功倍；導演即使好像我一樣不懂得分鏡，只要有一個好的攝影師，一樣可以拍出好戲來，聞說著名編劇岸西，她執導的電影，她只負責排戲的部分，分鏡的工作則由監製及攝影師替她分擔；氣氛營造可依賴燈光師；後期製作則有剪接師的幫忙；如能找到一個稱職的音樂人做配樂，就更加錦上添花。

不過，正正因為導演需要跟這麼多人合作，其人際的技巧一定不能差。一套滿分值一百分的劇集，如果稍有失手，被扣五分，仍有九十五分，但如果每個部門都扣五分，加起來的總分隨時變成不合格。導演就是要令所有部門都交足一百分的功課，要咁多人都肯替你賣命，導演少點個人魅力也不行。

編劇的工作很難，導演的工作一樣難，只要當大家都不視電視劇為一流水作業的工作，而是一門影響大眾生活，甚至當它是一門藝術的時候，其實所有崗位都不容易。下一次當大家欣賞到一個精彩的劇集時，希望觀眾不要吝嗇掌聲，因為這是經過好多人的努力而成的。

那幾棵核桃樹

百家廊

袁星

妻子上夜班，我到科裡加班，各忙各的。晚上八點多鐘，妻子給我打電話，讓我加完班回家裡砸十多個核桃，第二天下夜班後給兒子磨核桃汁喝。

加班回家時已近夜裡十點，簡單洗刷後開始吃飯。由於疲憊、困乏，休息了不一會兒就睡覺了，當晚沒能按妻子要求給兒子砸出核桃仁。

我家的乾核桃，總共有十幾斤，是親戚和鄰居們給的。我家沒有大核桃樹，有一棵小核桃樹才剛掛果，一年摘不了幾個。秋後，鄰村的四姨家和村裡的哥嫂、嬸子、大娘家，有核桃樹的，有的收了核桃，脫去青皮曬乾，三十個二十個的，一斤二斤的，給父母送來。送核桃的理由基本一致：東西不多，給梓航吃的，別嫌少。

梓航是我兒子的名字，才兩歲半。我們那兒的農村，鄉親們都不太會表達。送東西就是送東西，沒啥花言巧語。我兒子出生不久，嬸子大娘家有養草雞的，串門時給我家送幾個草雞蛋，三個五個、十個八個的都有。送雞蛋的理由也大致一樣：俺家母雞不多，下蛋少，送兩個來給她娘倆吃，別嫌少。

我老家那邊，現在的經濟條件並不差。村裡都有賣商品和蔬菜的超市，買魚肉雞蛋，早就已經不需要出村了。幾個十幾個草雞蛋，一斤二斤的乾核桃，也算不得多麼貴重。鄉鄰之間的這種往來，卻十分頻繁十分真誠。我之所以一直覺得，農村老家才更像家，或許就是與這種毫無遮掩的交往有關。

那次回老家，大娘家送來二十多個帶青皮的鮮核桃，兒子哭鬧着要吃。脫皮不方便，母親就拿出幾個已經曬乾的核桃出來。我餵兒子吃了兩個，不敢再讓他多吃。兒子沒吃夠，見沒人再給他砸核桃，自己吃力地提着小釘錘，趔趔趄趄走到一小堆核桃旁，一下一下用小釘錘的錘頭去壓核桃。

在農村老家那邊，不管認識不認識，走到誰家的果園邊，摘三五個蘋果、桃子吃，就跟吃自家的一樣，只要別太過分，一般沒有人跑出來責怪。「好吃的東西，吃兩個有啥？不好吃，讓吃人家還不吃呢！」這是鄉親們普遍的觀點。

父母的家院東面，有一片山楂園。我六七歲時，那兒還是奶奶家的一棟舊宅子。宅院門口，有一棵「Y」形向北斜上生長的老核桃樹。核桃樹底部靠近地面的地方，約一抱粗。從核桃結果到成熟，奶奶從早到晚在核桃樹下喝茶，誰都甭想偷摘一個核桃。

在奶奶家後面的壩子上，是一處平坦的院落。這院落是我不遠的一個大娘家的。她家的院落裡，也栽有一棵大核桃樹。每年都能結不少核桃。

那時村裡核桃樹多，可惜樹上常有一種俗稱「疤了夾子」的刺蛾幼蟲，皮膚一旦碰觸到牠們或牠們掉落的毛刺，就立即一陣陣針扎樣刺疼，外加瘙癢。接着，被蜇刺的皮膚上就會鼓起一個一角硬幣大小一兩毫米厚的小疙瘩。

我們那時偷核桃，不是為了貪吃，而是為了好玩。拿起小石塊，對準核桃樹上的核桃遠遠扔上去，巧了就能打中。撿起打中的核桃，跑到河溝邊，找個有淺淺的流水通過的粗糙石頭，把帶皮的鮮核桃按在水中，在石頭上一下一下來回磨，直到把青皮磨淨才拿出來。磨核桃要在水裡磨，這是小夥伴們積累的經驗。最初偷來核桃，小夥伴們就用石頭砸，砸爛鮮皮的時候，皮裡的汁液有時會迸濺到眼中，非常難受。就算迸濺到衣服上，因為不易清洗，有時也會挨揍。後來學會用石頭磨，這樣還有一個害處，磨完一個核桃，兩個手都被汁液染綠了，那汁液難褪色還燒手，非得等脫掉幾層皮才能顯出皮膚本色。

鮮核桃砸開後取仁，核桃仁外面有極薄的一層黃或褐色的膜，去掉那層薄膜，白色的果仁如溫潤白玉，香甜鮮美。帶着那層薄膜吃，味道則有點兒苦澀。而如果採摘時間過早，白色的果仁還沒成型，薄皮裡面僅有一些汁水，就不能吃。即便成熟了，因為剝皮非常困難，又很費工夫，小夥伴們也大多不太願意吃。

村裡有個大爺，會做「核桃車子」。「核桃車子」不是車，而是一種用乾核桃造成的小玩具。他把兩個乾核桃打孔後，中間用小細棍連接。上面的核桃只打一個孔固定，下面的核桃在相對兩孔中間的側面，再打一個小孔，取仁後用來拉出和纏入細線。將稍細於下面核桃孔的木棍，穿過兩個相對的孔，再插入上面的核桃孔內。細線的一頭，固定在下面那個核桃內的木棍上，另一頭通過側孔拉出。上面的核桃，也可用一根窄木條替換。製成後，擰動木棍，先把長約二、三十厘米的細線纏到核桃內的木棍上，然後有規律地一拉一鬆，細線在旋轉慣性的作用下，隨着拉鬆反覆在木棍上纏繞，上面的核桃就能持續地嘟嘟旋轉。擁有一個這樣的「核桃車子」，曾是我們一幫小夥伴很長時間的夢想。

妻子的重託，當晚沒能完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起床忙活。砸了十幾個核桃，取出核桃仁，打掃乾淨現場，急忙朝單位趕。到了單位才想起，我提前排了歇班。

和妻子一起回到家，妻子挑選了些黃豆，把核桃仁一起放進豆漿機打磨熬煮。等熬好了我們把它裝進保溫桶送回農村老家。

兒子喜歡吃核桃仁，也喜歡喝核桃露。有一次回家，我打開一罐核桃露倒了半杯給他品嚐，想看看他喜不喜歡喝。半杯核桃露很快下肚後，兒子拿着空杯子放到我跟前的桌子上。他看着我笑了笑說：「爸爸，我喝完了。」我答應道：「喝完了一邊玩去吧。」兒子很有禮貌地朝我笑笑，再笑笑。見我沒反應，就站在我前面開始背誦「經文」道：「XXXX午，汗XX禾X。XXXX餐，粒XXX苦。」不到三歲的孩子，咬字不清，我愣是沒聽清楚他念叨的什麼。兒子見我還沒表態，接着又來了一遍。「鋤XX當午，汗滴XX土。誰X盤中X，粒粒X辛苦。」第二遍，我終於弄明白了。我說你背《鋤禾》幹嗎？兒子聽我問他，才笑嘻嘻說：「爸爸，我還想喝。」

母親怕我沒明白兒子的意思，忙補充說：「梓航不給你背詩了麼，『粒粒皆辛苦』，意思是那罐核桃露得喝乾淨。」若不是母親及時提醒，我還真沒想到兒子是這意思。以他現在的理解力，應該還不明白《鋤禾》這首詩的意思，但母親給他餵飯的時候，見他喝不乾淨不肯再喝時，常教他背誦這首詩。或許，他知道，背了這首詩，東西就得喝乾淨。

我當時就被兒子的笑臉和小心思打動了。馬上倒上熱水，把剩下那半罐核桃露倒進杯子裡給他溫上。我不願意嬌慣孩子，但也不想打擊孩子。他努力爭取的東西，又沒絕對的危害因素，何必非得制止呢？

自製的黃豆核桃汁做成了，我叮囑妻子再加點兒白糖或冰糖，改善一下略略存在的苦澀味兒。回到農村老家，保溫桶裡的黃豆核桃汁正適合喝。兒子坐在小板凳上美美地喝他的黃豆核桃汁時，我的思維再次回到小時候。

那時候，村裡的核桃樹比現在多。奶奶家、大娘家、嬸子家，那幾棵老核桃樹的樹幹粗壯高大，枝繁葉茂，每年都結很多核桃。用這樣的核桃自製出來的核桃汁，口感或許比不上超市裡那些核桃露好，但卻是最最純正的「原汁原味」！

■核桃車子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王蒙和袁鷹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我在北京有好幾位作家老朋友，這一次見到的是王蒙和袁鷹。他們都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，袁鷹比我大兩歲，王蒙比我小五歲。

王蒙最近續弦，所以我也想見見他的新夫人。前年他的夫人病逝，我曾見過他，神形憔悴。畢竟是多年伴侶，而且他們夫妻情篤。他倆也與我稔熟，出雙入對，一旦陰陽相隔，哀痛何如，當可想到。

當我在報上看到他續弦的新聞時，便想到京時要與他倆一晤。在港先打電話給他的秘書彭先生，王蒙一口應允，定在周六晚聚會，並將派車來酒店接送。

他安排在一家新疆維吾爾族人經營的私家菜館設宴。館主人原來是曾任中央領導人的維族領袖賽福鼎的女兒。在座的還有另一位維吾爾族的歌唱家。我把在北京大學讀研究院的外孫兒也帶上。

他的新夫人單三婭落落大方，年約六十左右。據說曾在《光明日報》社工作。她話不多，只是殷勤招待客人。

兩位維吾爾族女士都會講流利的普通話，但王蒙卻不時用維吾爾族語與她們交談。他在新疆多年，工作在基層，而且因為擁有學習語言的天才，所以能說流利的維語。我當時笑說，如果不是他「超齡」，在此新疆多事之秋，他去擔任新疆黨委書記，頂合適。

袁鷹本人年近九旬，身體不好。他的老伴身體比他更差，況且還有一位因病殘廢的獨女，一家三口，都是老弱病殘。

我說前往探望他，他說剛搬了新居，附近又是工地，地方難找，還是他來酒店看我。盛情難卻，只好答應。

對這位持枴杖而來的老大哥，心裏不太好過。言談之下，他卻十分樂觀，而且筆耕不輟。他送我幾本新書，包括自傳和往事回憶。老人總喜歡寫的都是這些。他與我有同感，說體力不濟，但頭腦清醒。每天都勤於讀書和寫作，也許這也是長壽之道吧。

上餐館吃飯

隨想國

興國

北京工商部門為餐飲業設立了條款，如果餐飲業違規，就會重罰。這些條款，到底對餐飲業和消費者，有什麼好處和壞處？如果是設在香港又會如何？

來看看其中一條，是「包廂設低消」。這在香港寸金尺土的餐飲業來說，是比較容易執行的。從前香港的餐廳，很少是包廂有最低消費的，因為租金不像現今的昂貴。現在的餐廳，就設有包廂有最低消費了，皆因包廂有限，如果在包廂內點普通價廉菜式，成本上不划算。所以要想有私隱，就必須付出代價。

以前和朋友相聚，都喜歡訂包廂，因為可以不受影響，也不影響別人。但自從包廂設下最低消費後，朋友都不要求了，因為吃飯嘛，要吃得愉快，所以大家都不再要求了。更何況，那些貴價菜不一定是人人愛吃的。

再來看看另一條「禁止自帶酒水」。在香港，多數人都喜歡吃飯時飲紅酒，所以都會自帶紅酒。記得十多年前和朋友前往一家餐廳，朋友自攜的紅酒，餐廳收開瓶費一百五十元，和餐廳理論，那瓶紅酒是餐廳沒有的牌子，自帶不是應該嗎？因為朋友就只喝那個牌子，理論當然沒有效，最後朋友以後開飯，都到不收開瓶費的相熟餐廳了。

北京設的規定，倒是可以免卻這種爭拗，但較之香港的開瓶費，似乎更具趕客的效應。我和朋友如今常去光顧的餐廳，如果有空房，會把房間給我們，不收最低消費，自帶酒水也不另收費。久而久之，大家想到吃飯，都先想到這家。因為朋友一起吃飯，求的是吃得盡興而已。

面孔的價值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報載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周前發表署名文章指，中國的「謙虛時代」已成過去。作者戴維．皮林說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它是一個值得尊重甚至順從的國家。

作者借用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彭博通訊社總編輯馬修．溫克勒之口說，許多國家領導人和外企高層都感覺到了這種影響力。這與其說是西方觀察家的感受，毋寧說是國人希望看到的事實。

中國的外交政策多年來奉行鄧小平當年提倡的「韜光養晦」，這當然沒錯，但政策是應該隨形勢而調整的。既然今天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國，經濟實力加強，中國爭取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乃至發揮更大影響力也理所當然。

雖然中國在發展經濟過程中，難免出現隨之而來的不良現象，需要面對並有智慧地解決。但多年來，部分西方學者或帶着文化偏見或為了本身利益，從散播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，網絡媒體也不時有嘲笑中國人的言論，把中國塑造成不文明的國度，這不但影響到國家的形象，也影響到國人的待遇和尊嚴。

在南京大屠殺紀念日，看了張藝謀的《金陵十三釵》。電影不是描寫南京大屠殺，而只是取其中一段故事，描寫一群長期受歧視的女性如何在關鍵時刻，以實際行動喚起心靈深處的情感，展現一個人的情操。

但其中有兩個鏡頭令我印象深刻。日軍攻陷南京時，草菅人命，幾乎見人就開槍，但遇到了一位西洋面孔就怔住了，因為那位本是來華掘金的假冒神父舉起了「I am American」的牌子。另一個鏡頭是，聰明的妓女玉墨請求美國神父把她們救出南京城時，對方說沒有通行證，聰明的女人馬上說：你的面孔就是一張通行證，因為日本兵不敢惹西方人……

那雖然是七十六年前的歷史，但從米歇爾對彭麗媛的怠慢到美國電視節目上「殺死中國人」的童言，再到加拿大街頭「殺光中國人」的塗鴉，以及兩年前東京憤青們在九級地震後出現「殺支那豬」的言論，等等，除了反映中國經濟強勢崛起令那些有優越感的人出現心理不平衡外，也說明中國的長期謙讓有予人示弱的印象。